

新时代文物工作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推进新时代辽宁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

张克宇

辽宁是红色文化资源大省，在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保留了特色鲜明的革命文物遗存，以“六地”红色文化标识为代表的辽宁红色文化资源在全国红色文化遗产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六地”现已成为辽宁家喻户晓的红色文化标识，成为辽宁红色文化的光彩名片。

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为辽宁革命文物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起始地。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始于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沈阳北大营东北军官兵打响了反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不仅是中华民族第一篇抗日宣言，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篇反法西斯宣言。辽宁拥有完整记录抗日战争的红色文化遗址资源。其中，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12处抗战纪念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馆设施、遗址名录。

解放战争转折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后，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辽宁拥有数量众多的解放战争遗址遗迹，先后建设辽沈战役纪念馆、黑山阻击战纪念馆等解放战争时期的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新中国国歌素材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聂耳于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电影《风云儿女》不仅是在辽宁境内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生活为题材，而且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誓词和战歌也与《义勇军进行曲》高度相似，东北抗日义勇军用鲜血和生命奏响的抗日誓词和战歌凝聚的伟大民族精神已成为国歌之魂。

抗美援朝出征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别从安东(今辽宁丹东)和辑安(今吉林集安，当时属辽宁省)出征，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辽宁地区共有246.2万人次参加各种战勤工作，占当时总人口的11.7%，占青壮年劳动力的52.9%。

共和国工业奠基地。辽宁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之一。“一五”时期，辽宁承担了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的24项，在共和国工业发展史上，辽宁创造出了1000余项全国“第一”。沈阳工业博物馆、鞍钢博物馆记录着辽宁工业的历史与成就。鞍山钢铁厂等12项国家工业遗产作为重要的物质载体见证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成就与辉煌。

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是雷锋的第二故乡和雷锋精神的发祥地。雷锋在辽宁

工作和生活3年零9个月，沈阳、鞍山、抚顺、营口等6座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由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成长为全国人民学习的道德楷模，以“雷锋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在辽沈大地生根发芽，代代传承”。1960年，沈阳军区《前进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由此，全民性学习宣传雷锋的活动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坚持政治引领，注重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全省革命文物工作

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部署革命文物工作，把全省革命纪念馆建设发展列入重要议程。省领导多次过问抗美援朝纪念馆改扩建革命纪念馆建设工作，参加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开馆仪式并作出批示。省委常委多次集体到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等考察学习、指导工作。省政府统筹谋划辽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制定施行了《辽宁省“十四五”文物事业发展规划》《辽宁省红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22—2030年)》等政策文件，推动全省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充分发挥辽宁省革命历史类纪念馆、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作用，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调、属地实施、社会参与”的辽宁省革命文物工作协调联动机制。

树牢保护理念，深挖价值内涵，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工程

牢固树立保护第一的文物保护理念，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全面提高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2021年，辽宁省政府投入资金3000余万元，专项用于提升辽宁省百年党史的革命事件遗址、革命战斗遗址、革命机构旧址、革命人物旧居等保护展示水平，此项工作被列入2021年省政府“我为群众办实事”30件实事之一，广受社会好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坚持不改变革命文物原状的原则，坚持全面保护、整体保护，统筹推进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保护，确保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同时充分挖掘革命文化载体作用，传承和延续革命文物独特的价值和历史风貌。

坚持建管并重，加强工作指导，推动革命纪念馆建设提质升级

多年来，辽宁依托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和深厚的红色基因，结合百年党史不同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逐步建设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精神

风貌的革命纪念馆设施，形成较为完善的革命纪念馆体系。辽宁省现有革命纪念馆19家，其中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等4家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有12家博物馆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近年来，沈阳工业博物馆、鞍钢博物馆、黑山阻击战纪念馆等一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馆相继落成开放。雷锋纪念馆、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抗美援朝博物馆等一批革命纪念馆更新改造，经过改扩建或重新布展，在馆舍环境、硬件设施、展陈效果、服务水平等方面明显提升。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关向应故居纪念馆改扩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提质升级后的革命纪念馆将更加生动展现辽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历程，更好发挥“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的作用。

牢记初心使命，拓展教育功能，打造红色精品展陈

辽宁省始终坚持把实施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来抓。各博物馆、纪念馆开办以展现百年党史为主题的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展览陈列，在重大节日、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一系列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2021年，辽宁省19家革命纪念馆举办各类展览45个，接待观众853.8万人次，社会效益显著。

2021年，在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推介活动中，辽宁省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开国第一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展”等4项展览入围。今年，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4家革命纪念馆入选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单，充分发挥革命纪念馆在立德树人中的作用。同时，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大连博物馆的“圆梦——从北洋铁甲到航母舰队”被列入新时代博物馆百大陈列展览精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5家博物馆展览项目入选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项目。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和按照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要求，不断夯实革命文物工作基础，深入研究阐释革命文物内涵，统筹实施革命文物保护项目，不断拓展革命纪念馆的教育功能，打造更多主题突出、导向鲜明、内涵丰富的精品展览，让革命文物真正活起来，奋力推进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让科技文物活起来

——中国古代汲酒器和太空授课为演示大气压实验提供新思路

王洪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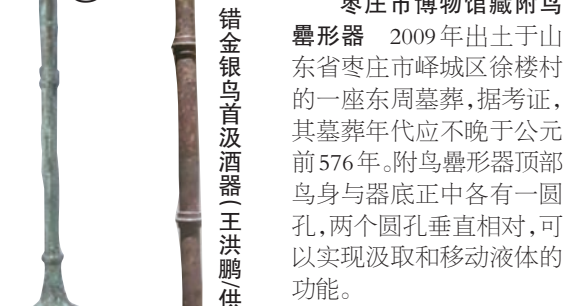
汲酒器是中国古代用来汲取酒水的一种器具，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目前，出土的汲酒器设计多为一体铸造，内部形成中空，上部和底部有小孔，孔径大小基本一致。汲酒器利用了大气压原理，具有汲取和移动水、酒等液体的功能。其操作十分简单，将汲酒器竖插入酒中，酒从下边的小孔进入容器内，空气则由上方的小孔排出来。如果用拇指压住上边的小孔，将汲酒器提起来，其内部的酒不会滴落；松开拇指，容器内的酒则会流出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为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指明了路径、遵循了根本遵循。笔者认为，利用中国科技馆科学实验表演宣传科技文物，具有独特的优势，不仅有利于科学与艺术、文化融合，还可以更有效地让科技文物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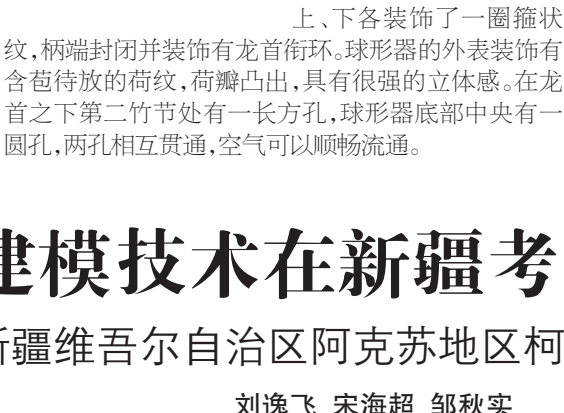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汲酒器造型美观，且原理简单易懂，通过复制还原这些精美的文物，既可以向公众很好地解释大气压强的原理，彰显中国古代人智慧，又可以将其转化为文创产品，让公众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经调研梳理，国内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汲酒器主要有以下三件。



（北京大学副教授胡钢供图）
附鸟壘形器



（淄博市博物馆供图）
竹节柄铜汲酒器



（淄博市博物馆供图）
错金银鸟首汲酒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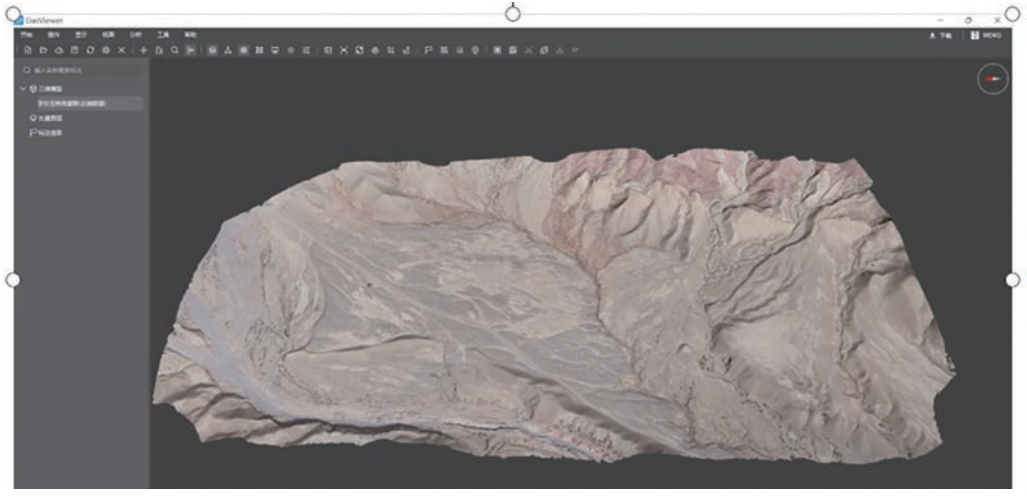
枣庄市博物馆藏附鸟壘形器 2009年出土于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徐楼村的一座西周墓葬，据考证，其墓葬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576年。附鸟壘形器顶部鸟身与器底正中各有一圆孔，两个圆孔垂直相对，可以实现汲取和移动液体的功能。

淄博市博物馆藏竹节柄铜汲酒器 1992年出土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商王村战国一号墓，根据考古发掘简报记载，其墓葬年代应在公元前266年至前221年。竹节柄铜汲酒器是一件竹管状长柄，下接平底、中空、形如荷蕾的球形器。柄外表为四节竹节形，上、下各装饰了一圈箍状纹，柄端封闭并装饰有龙首衔环。球形器的外表装饰有含苞待放的荷纹，荷瓣凸出，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在龙首之下第二竹节处有一方孔，球形器底部中央有一圆孔，两孔相互贯通，空气可以顺畅流通。

新型三维建模技术在新疆考古调查中的应用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田野调查为例

刘逸飞 宋海超 邹秋实



云端地球建模软件界面

今年4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人民政府支持下，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对柯坪县域内文物资源进行系统性田野调查和测绘。在调查中，使用无人机对遗址进行倾斜摄影测量，并采用武汉大学自主研发的三维模型软件，对遗址的空间信息进行采集。较之于国内较为常用的遗址三维建模方式，本次调查采用的三维建模方案效率更高，技术门槛更低，现将基本成果介绍如下。

数据测绘与处理

1956年，考古工作者开始采用航空照片观察研究遗址、墓葬。1970年后，部分文博单位开始对一些规模较大的遗址采用航空摄影进行野外勘测，如秦始皇陵、长城、寿春城等。200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建立“中国遥感考古研究联合实验室”，重点对大型线性遗址进行调查。2010年以后，多种遥感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勘测和研究之中。

柯坪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最西端，处于天山支脉阿塔格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史前时期，柯坪县已经有了人类活动。汉唐以来，作为丝绸之路中段中线的重要节点，柯坪处于东西方全方位交流的中心地带，更是扮演着中转驿站的重要角色。本次调查我们对柯坪

县域内5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航测、踏查、测绘面积8平方公里。

1. 室内准备阶段
本次调查选用的主力无人机设备型号为大疆精灵4RTK，支持7公里图传距离，配备1英寸2000万像素CMOS传感器，内置RTK模块，支持PPK后处理，支持GS RTK APP。

新疆田野调查多在偏远之地，大型无人机不便携带，一般使用便携无人机进行作业。此类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不强，一块电池仅能支撑20分钟左右，遇到大风高温等，实际飞行时长会更短。这就需要携带数块电池进行作业，如果调查范围大、数量多，那么需要数十块电池也是常见的。

在田野调查开始之前，我们了解到50处遗址的大致分布，将其分为若干个测绘区以方便作业。首先将现有的遗址坐标导入omap电子地图，根据遗址的分布规划出大致的调查路线。其次，了解遗址所在区域是否为禁飞区。

在有信号的区域，无人机设备联网并使用GPS定位加载出当前位置地图，再规划航线等工作。由于新疆许多地域处于荒漠戈壁，为避免作业时遇到没有信号无法加载地图的情况，需要提前根据遗址经纬度下载该区域的离线地图。如在野外碰到未提前下载地图的突发情况，亦可直接采用无人机定位，根据经验确定范围，规划

航线进行测绘。

2. 野外现场作业
此次田野调查以“三普”工作为基础，同时对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踏查。测量均采用摄影测量3D(井字飞行)，即按照井字路线进行飞行航拍，飞行高度为100米至200米，飞行速度为5—10米/秒，航向重叠、旁向重叠设置为80%，云台角度为-90°，开启高程优化，便于后期建模。根据天气状况，灵活调整白平衡模式。

检查无人机的电池、云台等状态，校准IMU、指南针等传感器，开启避障，刷新起始点位置，划定飞行路线，无人机攀升至飞行高度后按照既定航线开始作业，完成作业后自动返航至起始点。

柯坪县有山区、戈壁、沙漠三种地形。山区情况复杂，不少戍堡遗址分布在两山之间的山腰上，山间狭窄，飞行难度较大。为确保安全，我们在山区进行作业时尽量采用手动飞行。部分戈壁与沙漠地区地势起伏较大，应及时观察无人机的姿态，此外还要注意沙砾对镜头的伤害。便携无人机抗风能力不强，在实际作业中充分考虑天气情况。新疆地区大型鸟类众多，工作中还应注意鸟类是否在无人机的飞行空域中。

3. 云端数据分析
目前，利用Photoscan、ContextCapture等软件对无人机拍摄的照片进行三维建模，已在国内田野考古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次调查我们运用了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云端地球”软件进行建模，只需要将无人机拍摄的原始照片通过互联网上传至“云端地球”网页，即可自动完成遗址实景三维模型、数字表面模型(DSM)、正射影像(DOM)的生成，将巨大的数据处理任务交由后台服务器。

野外调查过程中配备的笔记本电脑往往不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对于原始照片达到

1000张以上的遗址，普通的办公电脑难以完成建模任务。需要待野外工作结束后，借助专业的图形工作站才能完成建模。本次调查采用的方法，效率高、技术、设备门槛低，更适应于田野考古现场的复杂环境。当日野外测绘数据次日凌晨即可完成建模工作。对正射影像、数字表面模型进行查看和研判，在实景三维模型上进行制定距离、面积等信息的测算和计算，以进一步制定针对性的调查方案。同时，新疆野外工作环境艰苦，采用航测及三维建模技术取代传统测绘工作，在保证测量准确性的基础上，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强度。

结果研判
新疆地区遗址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地表一般都残留部分建筑，这为通过航测结果研判遗迹提供了条件。沙漠地区地表有大量以植被为中心的沙堆，其中有些是自然形成，有些覆盖在建筑残垣上，给航测结果研判增加了一定难度。往往在数据分析后，我们再赶赴现场对各处迹象进行重新研判，确定其为自然形成还是人为修建。

柯坪地区遗址是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地表一般都残留部分建筑，这为通过航测结果研判遗迹提供了条件。沙漠地区地表有大量以植被为中心的沙堆，其中有些是自然形成，有些覆盖在建筑残垣上，给航测结果研判增加了一定难度。往往在数据分析后，我们再赶赴现场对各处迹象进行重新研判，确定其为自然形成还是人为修建。

柯坪地区遗址是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地表一般都残留部分建筑，这为通过航测结果研判遗迹提供了条件。沙漠地区地表有大量以植被为中心的沙堆，其中有些是自然形成，有些覆盖在建筑残垣上，给航测结果研判增加了一定难度。往往在数据分析后，我们再赶赴现场对各处迹象进行重新研判，确定其为自然形成还是人为修建。

柯坪地区遗址是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地表一般都残留部分建筑，这为通过航测结果研判遗迹提供了条件。沙漠地区地表有大量以植被为中心的沙堆，其中有些是自然形成，有些覆盖在建筑残垣上，给航测结果研判增加了一定难度。往往在数据分析后，我们再赶赴现场对各处迹象进行重新研判，确定其为自然形成还是人为修建。

柯坪地区遗址是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地表一般都残留部分建筑，这为通过航测结果研判遗迹提供了条件。沙漠地区地表有大量以植被为中心的沙堆，其中有些是自然形成，有些覆盖在建筑残垣上，给航测结果研判增加了一定难度。往往在数据分析后，我们再赶赴现场对各处迹象进行重新研判，确定其为自然形成还是人为修建。

柯坪地区遗址是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地表一般都残留部分建筑，这为通过航测结果研判遗迹提供了条件。沙漠地区地表有大量以植被为中心的沙堆，其中有些是自然形成，有些覆盖在建筑残垣上，给航测结果研判增加了一定难度。往往在数据分析后，我们再赶赴现场对各处迹象进行重新研判，确定其为自然形成还是人为修建。